是避敌自保还是高明战略
——刘铭传撤守基隆新史料辨析

孔 祥 吉

刘铭传在台湾几乎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开发台湾，建设宝岛的历史功绩，他不顾守旧势力的阻挠，倡议修筑铁路，向西方学习先进的东西的高瞻远瞩，都让人油然而生高山仰止的敬意。然而，金无足赤，刘氏在台湾也有他的过失，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基隆撤兵问题。

刘铭传撤守基隆曾遭到时人非议

刘铭传系安徽省合肥西乡人，是淮军的重要将领之一。光绪十年闰五月初四日，刘氏奉命以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抵台不久即击溃了侵略基隆的法军，首战告捷，军威一振。尔后在八月十三日黎明，法军再次进攻基隆时，刘氏率部迎敌，往复冲荡，各有伤亡。在战事呈胶着状态的相持阶段，刘氏于当晚突然下令撤军，将阵地拱手让敌，命令下达之后，全军震惊。“诸将以为方战胜而退军非计，有叩马泣谏者，不听。章高元伏地痛哭，阻止退军。公（指刘铭传）大怒，拔佩刀砍前案曰：吾计已决，罪谴吾自当之，有违者斩。”①于是全军挥泪而退。使法军轻而易举地得到基隆，实现了“据地为质”的愿望。

刘铭传撤守基隆，当时就受到督办福建军务之大学士左宗棠的严厉弹劾，认为刘氏此举系偏听其营务处知府李彤恩之鼓惑，避敌自保“继又坐守台北，不图进取”。而刘氏则上书清廷辩解谓“基隆万分危迫，沪尾又被急攻，基隆无兵可分，沪尾又当基隆后路，离府城（台北）只三十里，仅恃一线之口，商船声息稍通，军状粮饷尽在府城，倘根本一失，前军不战立溃，必至全局瓦解，莫可挽回，不得不先其所急，移师后路，藉保府城”。

刘铭传撤守基隆，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这在当时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清廷则因此事涉及湘淮矛盾，亦采取模棱两可的立场。但是，多年来在近代史的研究中，有一种倾向，尤其是在台湾史学界，由于考虑到刘氏开发台湾、建设台湾的历史贡献，对刘氏在中法战争中的表现亦全面肯定。不少有关刘铭传的传记把刘氏撤守基隆说成是“至当战略”、“高明措施”。其实，这种说法是否站得住脚，是很值得怀疑的。

新史料的发现

最近，我在美国见到一封翁同龢致醇亲王奕譞密信的底稿。该信收录在《朴园越议》中。《朴园越议》是翁同龢本人将中法战争期间醇亲王给他的信函汇编在一起，同时，又夹杂着一些他给醇亲王复信的底稿。奕譞字朴庵，故翁氏把这些谈论越南问题的信件命名为《朴园越议》，它对研究中法战争的历史是一部至关重要的未刊史料，其中有关刘铭传的信是这样写的：

日日内值，予外事无闻。昨始讯台事，得见省三幕客汪姓函云：省三基隆撤兵，宜兰退扎，大不理于象口，而义勇因此建旗，省三迫不得已，乃劝义勇改为土勇，约七千余人，分隶各统领，而省三之威望损矣。昨又接刘泫来信，其言亦同。刘泫者，刘璈之子，妄人也。去岁来谒，（怒而绝之）麾□门外，近始以台事告云：省三退扎宜兰之竹灿地方，不肯出战，（地方）绅民欲将刘捆送于法人。又云：所带裕庚，一切招摇，不堪名言云云。虽一偏之词，然证以赫德所云，申报所述，恐未为无因也（刘幕中汪姓函正合，然则省三其可恃乎？夫有勇而不能用，基隆可复而不复……）。仅据所闻以告外，定海扎营图一纸并上，不一一。②

翁氏此函没有署名，但由笔迹可以断定，系翁氏亲笔所写，所述内容极关重要，但该函未署时间，兹据《翁文恭公日记》略予考订，翁氏记曰：

甲申九月二十四日，到乾清宫，申正还，得醇邸函，得刘泫信……闻赫德等得外国信，云刘铭传不守淡水，被本地人窘辱，不敢打仗。谅山观音桥一带大捷，现四路进兵。

甲申九月二十五日，于季和处见汪君自台来信，刘帅误听淡水有警，弃基隆而去，台人大怒，台勇有七千余，将建义旗，经绅士劝解，改为土勇，分属诸将，盛称孙开华淡水之功。

查上引翁氏致醇王函提到，“昨始汛讯台事，得见省三幕客汪姓函”，而翁氏九月二十五日的日记恰好提到“于季和处见汪君自台来信”云云。可见翁氏此函当作于光绪十年九月二十六日，而翁氏日记是日亦有“致书醇邸”之载。这里的致醇邸书，即是本文上面所引的信。

翁氏致醇王函之史料价值

翁氏甲申九月二十六日致醇王函所揭示的内容，与目前史学界对刘铭传撤守基隆的评价是大相径庭的。笔者以为翁氏在信函中对刘氏的批评，应当引起史学界之重视，其理由如下：

其一，翁氏对刘铭传撤守基隆之非议，是在亲眼看到刘氏之幕僚的函件后才萌发的。这位幕僚由于长期在刘氏左右，目击刘氏在台之所作所为，并深刻了解撤守基隆的决策过程及台湾军民的强烈反响，他给京中友人信中所述内容，应该是真实可信的。而且，刘氏幕僚能给京中友人写信，揭露其主人之短处，这件事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其二，翁氏信件所述与淡水新关税务司法来格呈总税务司原文不乏相似之处。法来格云：刘爵帅退至板加地方，该地人民怒而围之，捉爵帅发，由轿中拽出肆殴，且诟之为汉奸，为懦夫。爵帅惟曰：好，好，尔辈欲我战乎？我今即回基隆去。但尔辈谁为愿随我去者？言甫毕，计挺身前立愿随爵帅者约有千五百人，爵帅即以火枪银钱分给此众，帅之而行。闻沿途收乐从人民已计有七千之多。

法来格此文与翁氏上醇亲王书不谋而合，有异曲同工之妙。法来格本人并没有牵涉湘淮之争，与刘铭传亦无恩怨纠葛；相反，刘氏于光绪十一年上书清廷，为法来格请奖。因此，法来格所述刘铭传的表现应予以重视。

其三，翁同龢对刘铭传的批评，没有受派系之争的影响，他对事件的评论很少掺杂个人恩怨。

晚近以来，有一种说法，认为翁、刘两家有恩怨之争，翁同龢利用手中权势扼抑刘氏。那么，翁氏上醇王函是否是个人恩怨在作祟？我以为答案是否定的。请看如下事实：

翁氏致醇王函之内容，除了来自汪姓幕僚的信函外，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即刘璈父子。刘璈，字兰州，湖南岳阳人，附生从军，为左宗棠幕中最得意者，光绪七年台湾道出缺，左氏保荐其加按察使衔，分巡台湾道。在刘铭传撤兵基隆前后，翁氏日记亦有数处提到刘璈父子：

九月初七日，刘璈寄四十金，却之。其子浤又送物，受台布三疋，线香廿指，茯苓一个，余均还。

甲申九月十三日，刘璈之子浤、竹溪，行一，来见，据云去岁赴越南探情况，历云粤边疆而归……今将往台省亲，语未可信，此人一面烟气，狂妄人也。

不难看出，尽管刘氏父子极尽攀龙附凤之能事，而翁氏却对他们印象不佳，因此对其有关基隆撤兵情况，并非毫无批评地接受，而是经过仔细斟酌、印证之后，才给醇王写信的。

翁氏不存派系成见，还可以从他于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日给醇王的另一封信中得到证实，该信谓：

北郊之行，不免劳顿，极驰仰……谅山大捷，而讲事在一迎一拒之间，深机难测；澎湖之信，深虑台北牵动淮湘不和，必误军机；拨饷渐渐有搪塞之意，迫行匆促，敬请钧安。③

显而易见，翁氏在处理湘淮关系时是小心谨慎的，不偏不袒。他的这种态度甚至与慈禧、奕譞等对湘淮之争的立场亦有不同。奕譞等从满族权贵的私利出发，往往利用这种矛盾，以达到操纵驾驭的目的。奕譞写给军机处的函件中曾公然宣称："留双峰插云之势，庶收二难竟爽之功"。正是在此种思想指导下，清廷在整个中法战争期间调兵遣将，都是湘淮相维，以使其相互牵制，相互制约，无形中使湘淮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而翁氏对此情况却是有所戒惕的。他的做法与满族权贵形成鲜明对照。因此，他的致醇王函在评价刘铭传基隆撤兵问题上有着重要价值。

刘铭传避敌自保造成严重后果

刘铭传撤守基隆问题，长期以来聚讼纷纭，孰是孰非，迄无定论。淮系认为沪尾比基隆重要，以军资饷械，皆萃台北，死守基隆，敌且袭后路制吾命，故撤守基隆是正确的；而湘系则认为刘氏之举动是避敌自保，失地辱国。清廷为了澄清是非，曾派帮办福建军务大臣杨岳斌前往台湾查覆。杨氏在查覆之结论中写道：李彤恩第知沪尾兵单，而不知孙开华诸将领之足恃；第知台北为重，而不知基隆失，难以速收，未免贻误戎机。杨氏表面上是指摘李彤恩，实际上是在影射刘铭传。现在的研究还表明，刘铭传并没有将从基隆撤退的主力投入沪尾守卫战，而且即使刘军不援沪尾，法军也很难战胜沪尾守军。因此，刘氏之撤守基隆，更多的是从保存淮系实力着想，而不是顾全大局。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刘氏撤守基隆之后，置清廷之三令五申和台湾民众之泣血呼号于脑后，拒不采取行动，收复基隆，给中法战争带来非常消极的影响。以至于使清廷在陆路大捷的情况下，也不敢将对法战争进行下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国占据了基隆。

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一是一，二是二，来不得半点虚假，稍有讳饰，便算不得史学。本文仅就刘铭传在基隆战役的表现，提供新史料，至于对刘氏一生的评价，则另当别论。

---

①《刘壮肃公奏议·卷首》。

②③翁同龢辑：《朴园越议》第二册。括号中文字系翁氏删去者。